



律政司須上訴 禁制「獨歌」傳播



律政司早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禁止以任何方式傳播「港獨」歌曲《願榮光歸香港》，但遭高等法院拒絕。在判決中，法官犯了四點法律錯誤，律政司應該上訴，以便上訴庭糾正，避免再有人藉此歌煽暴播「獨」進行「軟對抗」。

馬恩國 大律師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 選委會委員

首先，法官錯誤理解申請範圍，表示「律政司的申請並沒有禁止合法活動，也不構成對《願榮光歸香港》歌曲的全面禁止。」但是，該禁制令的目的以及措詞，是禁止任何以分裂國家為目的廣播、表演或出版這首歌。法官表示，「毫無疑問，這首歌曲被有意圖的人有效地利用」來鼓吹「港獨」，既然是這樣，這首歌如何在沒有分裂意圖的情況下合法地演奏呢？法官在自己的判決中也無法列舉任何合法播放或演奏例子。

禁制令有助執法判刑

第二，法官雖然使用了正確的法律原則(即禁制令是必要或有效用才能頒布)，但他在應用原則時犯了錯誤。原則規定，律政司必須證明，如果沒有禁令，歌曲將繼續被演奏，並且不能被有效限制。律政司是在尋求民事禁制令以輔助刑法的實施。因為刑法是「事後法」(在犯罪行為發生後懲罰人們的法律)，但批出

民事禁制令是「事前法」，政府可以在非法行為發生之前先發制人，阻止案件發生。

在是次禁制令的申請中，法官查看了香港國安法之中的分裂國家罪，發現該罪可判處無期徒刑，並得出結論：「如果這些被告敢冒著被長期監禁的風險仍然演奏播放這首歌，他們也不會怕違反禁制令的懲罰。因此，禁制令沒有威懾作用，所以是無用且不必要，法院也就不頒令了。」這理解顯然是錯誤的。

尊重法庭權威是法治精神的根本要素之一。法庭頒發的禁制令，受到香港社會的絕對尊重及嚴格遵從。如果有禁制令，有人通過「獨歌」煽暴播「獨」的話，他首先會因為違反禁制令而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審訊過程和時間遠比被控以其他罪行來得簡易和迅速，懲治來得更有效率，這何嘗不是一種功效呢？法官在判詞中寫道：「證據沒有說明禁制令將如何減低歌曲的流行度」，並且「罪犯不太可能被額外的禁制令嚇倒。」不過，如果人們很清楚地知

道，播「獨歌」違反禁制令，將很快被法律制裁，而不必與漫長的審判糾纏，這難道不是一種威懾作用嗎？

國歌屢次被侮不能容忍

第三，法官說：「更有效的工具(阻止這些違法者不播放歌曲)可能是教育」，這是完全不合適的。毫無疑問，教育局在香港國安法下有其職責，但當法官在判詞中說這是教育的問題，心態很明顯是在推卸責任。根據香港國安法，司法機關對危害國家安全行為負有有效預防、制止和懲治的責任，法官在判詞中也承認這一點。可是，人們只能從判詞中看出，這一責任是如何沒有被履行，特別是在法官清楚認為「毫無疑問，這首歌的目的是為了喚起反建制情緒和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分離的信念」。

第四，法官錯誤地對其他同類的公眾禁制令案例作出區分，並選擇不予遵循。在申請中，

律政司引用了許多公眾禁制令案例，包括非法故意對警察及其家人進行人肉搜索案，高等法院針對廣大公眾發布了禁令。這些應該是很有說服力的案例，但不為法官所接受。法官認為，以上案例都發生在2019年的「極端情況」下，當時香港正值修例風波。法官給了自己一個價值判斷——只有在暴亂時期才應該頒發公眾禁制令。

法官又在判詞中承認，這首歌在「YouTube」上有不少於9個關於這首歌的視頻，「還有19個其他頻道發布了這首歌的不同版本」，他也意識到「在國際體育賽事上錯誤地把這首歌當作國歌來演奏，此類事件對很多香港人來說，無疑是非常尷尬和傷害的。」在體育賽事中，我國國歌屢次被侮辱，還不夠「極端」？法官的觀點的確相當扭曲和怪異。

鑑於上述許多可識別的法律錯誤，律政司應積極上訴，以便上訴庭糾正這些錯誤。

愛國愛港力量要為社會發展增動能

譚錦球 全國政協常委 香港友好協進會會長 香港義工聯盟主席



新一屆區議會選舉將於12月10日舉行。新的區議會將回歸服務市民的功能定位，完善地區治理，惠及廣大市民。香港友好協進會作為愛國愛港組織，全力支持政府重組區議會工作，積極參與關愛隊，並於7月21日成立友好關愛緊急援助基金，與全港關愛隊一起，齊心協力服務市民。在香港由治及興的階段，愛國愛港力量要勇擔完善地區治理、振興香港經濟重任，為地區發展增動能，為市民帶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

在重組區議會的同時，特區政府也組成「地區治理領導委員會」和「地區治理專組」，為區議會訂立會議常規和為區議會的應有表現及失當行為制訂標準、甄選合適的愛國愛港有能之士委任為區議員等。目前各區關愛隊亦加緊成立，正形成全港各界參與、共同關愛基層、完善地區治理的合力。

在「愛國者治港」原則全面落實之後，市民對行政立法及地區治理的管理質素，有了更高的期待與要求。中聯辦主任鄭雁雄日前到立法會時寄語立法會議員：「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激發一切可以激發的活力，不斷發展壯大建設香港的積極力量，畫出最大同心圓，奮力推動香港由治及興。」這番話同樣可看成是對愛國愛港力量的

新要求。「愛國者治港」的新氣象，要通過愛國愛港力量切實推動地區關愛服務等體現出來。愛國愛港力量要出錢出力、深入基層，既做好緊急突發事件時的支援服務，亦踏實解決基層民生難題，與新的區議會等形成地區治理合力，完善地區治理水平。

目前國家經濟正穩步向好，中央近期作出經濟工作部署，大力提振內需，加大推進高質量發展力度，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培育壯大戰略新興產業等，並出台政策鼓勵民營經濟大發展。這對香港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構建雙循環新格局、振興香港經濟有重要指引作用。愛國愛港力量過往在維護國家安全、抵制反中亂港勢力、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國家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愛國愛港力量應勇擔振興香港經濟重任。一是要助力特區政府力拓東盟市場、爭取香港盡早加入RCEP，發揮對外聯絡廣泛的優勢，構建廣泛的經貿網；二是服務國家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和發展新能源車等新興產業戰略部署，發揮專業服務優勢，完善國家產業鏈、供應鏈，幫助新產業開拓國際市場；三是主動積極溝通內地省市，為香港引人才、引企業、引遊客，同時服務好內地省市在港的經貿活動、文化推廣等。在由治及興新階段，愛國愛港力量齊心協力、共同奮鬥，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必將令香港興的動能更加強勁有力。

維護國家安全 築牢國家大門

宋忠平 時事評論員

近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伯恩斯出席阿斯彭安全論壇時稱，美在華情報網絡重建已取得進展，正努力構建強勁的人力情報收集能力，以補充其他情報獲取渠道。美方一邊反覆散布所謂中國間諜、網絡攻擊的虛假資訊，一邊毫不掩飾地宣稱要針對中國開展大規模情報活動。中方對此深為關切，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國家安全。

情報戰牽涉範圍廣

搜集情報的手段，包括技術情報和人工情報。技術情報就是利用技術手段獲取對手的重要秘密資訊，常用的包括偵聽、偵察、網絡駭客等。人工情報就是俗稱的諜報，通過安插特工人員、策反對手人員等方式獲取對手的重要資訊。技術情報和人工情報は互補的關係，有些技術情報無法獲取的資訊，只能通過人工情報獲取。

情報涉及到的內容眾多，不只局限於軍事情報，還包括經濟、科技、文化、國土、交通、地理資訊、生物、人口等各個領域。如日本情報部門之前就多次以個人旅遊名義對中國某些核心地域實施情報搜集工作，同時日本也會安插人員以跨國集團高管身份在中國境內搜集諸如經濟類情報。美國情報部門也是如此，通過多種渠道獲取對手國家的各類情報，包括策反意志薄弱者、誘騙涉密人員等。

由此可見，為了有效對抗中國並全面遏制中國的快速發展，美國對中國的情報戰已經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美軍的艦機密集在中國周邊抵近偵察，美國的衛星頻繁在中國頭頂飛越，美國在中國周邊密布的偵聽站和雷達站，都是美國對中國實施技術情報戰的重要抓手。

美國利用各種機會培養、安插情報人員，並重點策反某些重要知密攜密人員，大量獲取情報。同時，美國利用盟友的情報網絡體系，加大獲取對手國家的重

要情報，諸如「五眼聯盟」和北約等軍事組織都是美國的幫兇。這就是伯恩斯口口聲聲的「對華構建強勁的人力情報收集能力」。

香港受外力威脅風險高

香港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樞紐，並為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發揮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同時，由於香港城市的特殊性，這個城市也是形形色色、魚龍混雜，包括境外勢力也在利用香港作為平台獲取中國的相關情報資訊。由於香港「一國兩制」的獨特性，作為自由港的香港自然成為各類NGO和跨國企業雲集地，其中就有不少受僱於西方情報部門的人員在「掛羊頭賣狗肉」。相信伯恩斯指出的「美國在華情報網絡重建已取得進展，正努力構建強勁的人力情報收集能力」，重點就是要在香港布設情報網絡，繼續做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事情。

儘管香港國安法已付諸實施並對香港社會穩定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美國中情局依舊死性不改，必然繼續借助香港的特殊地位謀求發展基於人工情報的網絡體系，這本身必然會嚴重危及中國的國家安全。儘管在這種隱秘較量的較量日趨激烈，中央政府也有眾多新部署、新安排，但查漏補缺國家安全短板依舊十分重要。香港除了進一步夯實國安法的實施力度，強化維護國家安全之外，更需要盡快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對於香港築牢國家安全、補齊短板十分必要。不僅如此，完善基本法有助香港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和立法義務，讓香港成為伯恩斯之流無法滲透的設防城市，這才能確保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築牢維護國家安全的鋼鐵大門。

剛好有理

——體演文出——



霍啟剛 全國人大代表 立法會議員

推動愛國教育 建立主流價值觀

愛國是每個中國公民應有的義務，也是推動國家走向富強的基礎力量。全球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當中，民心的凝聚更為重要，而愛國主義教育的成效就是箇中關鍵。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主義教育法(草案)》(下稱「草案」)已經完成初審及公眾諮詢，雖然法例不一定會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但香港作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全社會都有責任配合國家全方位推動工作，讓愛國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植於每一個香港市民的內心。

第一，政府推動多部門協作，牽頭組織推動愛國教育，引起大眾關注。推動愛國教育是特區政府的責任，李家超特首早前亦已表示特區政府會對接國家在愛國主義教育的要求。過往，社會都聚焦於學校的愛國主義教育，教育局成為了推動的主力，表達方式較為傳統。但正如草案所言，我們應按學生需要「採取豐富適宜的教學方式」，筆者認為應突破現有思維，做好各部門之間的協調。例如草案提到需要推廣中國共產黨史、新中國史等，康文署旗下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可借常設展更新的機會加入相關元素；大受歡迎的太空館天幕電影廳上映與中國航天有關的影片；而創新科技及工業局的「智方便」亦可考慮加入虛擬實境功能，讓市民、遊客獲得親歷其境的沉浸式感受。相信跨部門落實的創新展示手法，將可以引起社會各界的興趣，為推動愛國教育工作打下穩固基礎。

第二，支持民間團體參與推廣工作，將愛國思想融入市民日常生活。除了特區政府牽頭推動外，要令受眾群體更廣，民間團體的參與必不可少。除了繼續推動各類主題交流考察團及愛國主義相關的論壇、講座外，亦可以更多採用中華傳統文化，例如水墨畫創作、中國功夫等，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載體。此外，鼓勵團體活化跟英雄烈士和先進模範人物有關的歷史古蹟，例如抗戰遺址，可以讓公眾以不同方式認識民族精神。筆者早前亦曾撰文建議優化「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提倡放寬申請團體的資格，倘若為商業機構的參與加入更多彈性，相信能有效確保場地的長期營運能力，讓愛國思想得以持續傳播。

第三，善用粵港澳大灣區資源，共同邁步前進。廣東省現時共有一百多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涵蓋名人故居、抗戰遺址等，是重要的教育資源。粵港澳大灣區內經常探討一程多站旅遊，特區政府應與內地共同制定紅色旅遊路線建議行程，讓大灣區內人民在互動的過程中更了解國家歷史。現時，特區政府為非牟利機構提供了多個內地交流資助計劃，以提升青年的民族身份認同。筆者建議應在申請條款中清楚列明參團日程需要包含一定的愛國主義教育元素，並在活動結束後評估成效，進一步加強交流團的成效。

總括而言，要讓愛國主義教育取得顯著成效，政府和民間機構必須共同協作，善用粵港澳大灣區內的資源，以創新手法向不同群體傳遞愛國思想。盼望特區政府積極行動，助年輕一代建立愛國愛港的主流價值觀，讓香港市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過程中作出更多貢獻。

推「兩地一檢」促旅客便利往來

梁熙 立法會議員



香港與內地人員往來頻密，提升過關效率最近也成為輿論熱議的話題。傳統上兩地較多採用「兩地兩檢」模式，如羅湖口岸般，旅客先在一方完成入境手續，再步行經過羅湖橋進入另一方完成入境手續。近年開通的口岸，如西九龍高鐵站，則採用「一地兩檢」模式，旅客可在同一座大樓完成出境及入境的手續，為大家帶來嶄新的體驗。

不過，無論「一地兩檢」還是「兩地兩檢」，兩者都有共同之處，就是旅客仍然需要兩度出示相關的身份證明文件，以完成整個出入境手續，某程度上仍有不便的地方。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早前考察了澳門橫琴和青茂關口運作，體驗了「兩地一檢」的新通關模式。來往珠澳的旅客，只需出示一次證件，就可以做到「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可說是解決當中關鍵問題，這對香港來說具有借鏡作用。毗鄰香港的澳門，早於2018年已經

突破性地採用「兩地一檢」模式，現時已在多個關口採用，同屬特區的香港千萬不可落後，以免影響與內地的人員往來。我們一定有能力做好這點，促進香港更好地發展。早前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會在重建沙頭角口岸及未來興建新口岸時考慮「兩地一檢」模式，無疑值得鼓勵。但政府在新建口岸推出新通關模式的同時，也要顧及對既有口岸的改造工作，特別是客流量極大的羅湖口岸，未來又是否有條件推行「兩地一檢」，為市民帶來更便利的通關體驗呢？

「兩地一檢」好處多，但推行和改造提升期間，旅客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特區政府也需要時間與內地方面協調。過去，每當社會議題涉及到與內地合作或者對接時，有心人士每每作出攻擊，雖然這種場面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但政府推出相關政策時，仍要考慮做好解說的工作，突出方案的便利性，並就公眾關心的私隱問題主動回應以釋除大家的疑慮，從而創造更有利的實施條件。